

间隔年:青年心理—社会发展的新时空

■ 陈玉真 沈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 102401)

【摘要】随着全球化时代复合时空背景下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个体层面心理复杂性的提升,间隔年在外在形式上作为一种青年生活新模式逐渐兴起,并且作为个体常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而出现。基于自我同一性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在社会不确定性境况下,间隔年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间和空间结合体,通过多元化、弹性化的探索实践,青年在建立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中获得更加广阔和丰富的场域,找到更加确定的参照系,进而让迈向成年的步调更加稳健和有序。因此,社会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支持系统来促进间隔年正效应实现最大化。

【关键词】间隔年 青年 心理—社会发展 自我同一性 新时空

一、引言

间隔年(Gap Year)起源于20世纪的英国,一般是指某些青年人在完成高中学业之后、进入大学之前,或大学毕业之后、踏入职场之前,暂停常规的学业或职业进程,选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去打工、做志愿服务、旅行或开展其他探索性活动(如技能培训、创业实验等)^[1]。对于处在人生发展进程中一个独特阶段的青年人而言,这样一段经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常规意义上的休假方式,它具有丰富而重要的自我探索意涵和自我成长意义。根据一项全球性调查的结果,在发达国家,青年人选择参与间隔年的比例达到12%—18%^[2]。

间隔年这一最先出现于国外的社会现象,近些年在我国也出现了。在国外,间隔年通常为时一年,所以称“间隔年”较为恰当;而在我国,类似现象的时长更为灵活,并不固定为一年,因此称为间隔期(Gap Time)更为恰当。当然,将间隔年不作为一年理解,而作为数年理解(Gap Years)的话,尽管在间隔期限的呈现形式上可能仍存在一些差异,但其与间隔期完全同义了。

进入21世纪之后,间隔年现象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9年,豆瓣网友自发创建了

收稿日期:2025-05-08

作者简介:陈玉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为社会心理、青年世代;

沈 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为社会心理、青年世代。

“间隔年旅游网”,为义工旅游和工作旅行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2014年,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会成立,为青年人参与间隔年提供专项基金。间隔年文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一些作家的笔触逐渐涉及间隔年现象,一批书籍陆续出版。例如,蔻蔻梁的《辞职,去旅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陈宇欣的《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中信出版社2012年)、龙泓全的《间隔年,浪迹拉美》(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年)、孙东纯的《迟到的间隔年》(中信出版社2015年)、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会的《间隔年:给青春一场壮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蔡璐璐的《间隔年,一个女孩在旅行》(江苏文艺出版社2023年)等。

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对间隔年现象给予关注并进行探讨,呈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洞见主要包括:(1)间隔年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一种新兴行为和社会心态,具有青少年“成年新礼”的特征^[3];(2)间隔年是青年参与的一项生活政治,是对现实生活的抵抗与反叛^[4];(3)间隔年可以被视为个体自我探索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个体适应社会、准备未来角色的重要阶段^[5];(4)间隔年反映了当今社会变迁对青年生命历程的影响,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正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6],间隔年已成为青年迈向成年的一种非传统的过渡方式;(5)间隔年在我国的本地化践行是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方式的必要、重要和有效补充^[7]等。

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和青年社会学的分析视角,认为间隔年外在形式表现为当今青年心理—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时空,内在实质则反映了青年自我同一性在当今复合时空中的探索性建构和重构。就间隔期的具体内涵而言,笔者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复读期”(准备再考大学)、“二战期”(准备再考研究生),甚至“三战期”“四战期”等属于狭义的间隔年,而“慢就业期”“备考公期”等可以纳入广义的间隔年。“复读期”“二战期”(甚至“三战期”“四战期”等)之后如果成功考取并再度入学的话,这样的间隔年仍然处在帕森斯所谓的“学生期”之间的中断期^①,是青年期的延长期^[8]。因此,这样的间隔年实质上仍属于青年期的一个部分(此时还不属于成年期),而且是当代社会中青年期新出现的一个部分。而“慢就业期”“备考公期”等这样的间隔期则可以看作是所谓的阿奈特“成年初显期”^②[9]。

简略地说,间隔年现象是主客观动因的综合产物。在主观层面上,新时空背景下的青年人出现了一些新质需求和新型追求,主要表现为由于丰裕时代的来临和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更年轻一代的人们对于自主性、探索性和体验性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向往,他们从新的维度和更多层面寻求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和重构;在客观层面上,新的时空背景下影响人们生命历程的社会规制、文化约束的相关机制及其构成因素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转型和松解,为青年人寻求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和重构提供了新契机和参照系。间隔年既表现为一段新的时间,又表现为一种新的空间,在实质上呈现出对于青年人生命历程而言,与以往时代所不同的新结构要素和新功能。

① 帕森斯于20世纪50年代指出,由于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已经使现代社会的人口结构中一定比例人们生命进程中呈现一种新的现象即“学生期”。帕森斯基于弗洛伊德关于人的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在人的生命周期中增加了“学生期”这一阶段。进一步说,高等教育的普及不仅使现代社会的人口结构中增添了一种新的成分即学生,而且也使越来越多人的生命周期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学生期。这一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为社会体系一部分的教育体系,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生命进程中某个阶段或时期的形成,以及对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们即青年作为学生的塑造。学生期成为当代社会中青年期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② “成年初显期”又译为“成年呈现期”“新兴成年期”。这是阿奈特对于当代社会中青年期延长所呈现的新特质的一种命名。

二、作为一种社会特例的间隔年发生

1. 现代性风险与社会不确定性增加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文化交汇的同时,也引发了经济不平等、环境压力增大、资源减少、价值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一些社会学家从不同视角进行了阐释:乌里尔希·贝克视之为“风险社会”,安东尼·吉登斯称其为“失控的世界”,齐格蒙特·鲍曼谓之“流动的现代社会”等。这些不同分析和表述中的一个核心共识便是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从更具体的层面上看,社会不确定性程度增加,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缓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所带来的就业风险,使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个体,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敏锐的不确定感和强烈的风险意识。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风险不仅有其客观存在性维度,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主观建构性维度,即风险也是人们主观感知的结果,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文化”^[10]。所谓风险,指人们在自觉把握行动前提的基础上,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难以预测的各种情势做出清醒的预估,并且基于这种预估在行动上进行选择或调整。换言之,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将会直接影响其行动取向及其结果。这种逐渐增长的社会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以往对于个体生命历程具有规制作用的一些社会结构成分和社会文化因素正在发生变迁。这使得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中原来已经固化的、对于人们生命历程存在制约的框架发生变化和转型,呈现某种比较性的松解特质。

2. 个体化作为应对现代性风险的人生策略

与全球化这一宏观层面上的变迁趋势相伴生的,是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化趋势。在现代性风险中,人们应对社会不确定性的一种具体践行策略就是个体化。个体化趋势的重要功能之一则表现为,它是个体应对风险社会的一种灵活方式。个体化的实质是:在当今社会变迁加速和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方式进一步开放、弹性的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作为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其独立性、特殊性、主体性得以日益凸显。从具体层面的动因上看,一是教育领域竞争愈演愈烈,比如PISA排名的盛行;二是就业市场的弹性化,比如零工经济占比达近三分之一^①;三是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的变化,比如“空巢青年”规模扩大,有关调查结果显示,“空巢青年”已经超过5800万^②。这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结构上的个体化趋势的生成机制。青年人心理成熟的预期时限进一步向后延伸,构成他们生命历程的阶段或环节似乎呈现增加趋势。于是,间隔年成了青年人应对社会演变进程中不确定性因素与自身生命历程中不规则性因素的主动性策略或被动的权宜之计。从一定意义上说,选择参与间隔年的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更主要的是他们的能动性特质。

3. 个体生命周期呈现去标准化态势

社会结构层面呈现出更多的弹性化特质,以及社会主体层面呈现出更多的个体化特质,这些引发的一个后果就是以往社会进程中人们常规的生命历程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即去标准化,甚至很大程度上会失模式化。最突出地表现为个体的生活进程中出现了

① 《2022中国零工经济行业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一线城市的灵活用工占比达25.6%。零工经济悄然兴起,持续健康发展需直面挑战, https://jsnews.jschina.com.cn/shms/202309/t20230911_3281470.shtml。

② “孤独经济”来袭,5800万空巢青年背后的“孤独文化”, <https://www.163.com/dy/article/DKBDCLUC0518W078.html>。

两个核心性变化:一是标准化或遵循式的人生模式变成了弹性化或选择性的人生模式;二是人生面临的风险及其可能产生的相关责任都变得个体化了。青年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认为,青年期是童年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期,个体生命进程具体地表现为由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主要包括:个体离开父母、家庭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进入就业市场,结婚、成家、生育子女等)构成的生命周期,这些事件之间有着固定的、不可逆的顺序,比如,学校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人生进程顺序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生命周期中的固定阶段或环节。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将这种节律呈现出来,便形成了标准化的、个人传记式的人生进程。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一种进程的、直线式或线性(即不可逆)的人生模式^[11]。而间隔年的出现,似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青年人重构人生秩序和调整生活节律的一种主动策略和选择路径。这种个体时空自主性的扩展及其产生的、对于社会时空选择性的扩展,意味着社会结构中对人们生命进程的安排机制和规范体系正朝着弹性化或柔性化的方向转型。

在一些学者看来,间隔年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比如,李春瑶认为,中国式间隔年现象的出现,在社会面临的结构性就业困境下,其特征表现为一种另类内卷实践,因而社会应给予理解与支持^[12]。王尧骏和张姗姗指出,间隔年有助于学生缓解压力、提升就业能力、开阔视野眼界,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加以改进和逐渐完善^[13]。笔者认为,间隔年这一社会特例的出现,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独特作用表现在,对于埃里克森人生发展理论中所说青年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或可视为是对青年心理—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和潜在功能,进行一次新的重构和拓展。因此,间隔年这一新的时空结构显现或潜在的具体效应可以是:为青年提供柔性化的人生模式、弹性化的探索机遇、多样化的体验内容,既可以预防、缓解和消除青年期最容易发生的自我同一性的诸多问题,如封闭、弥散或混乱、危机,又可以为青年形成自主性特质、获得探索性意义和满足体验性需要创造基本条件。从总体上看,间隔年现象折射出当今流动性社会结构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规制性松解。这种新型的人生进程样式对青年个体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生命历程中经历间隔年的最明显的负效应表现在,成长的时间成本会有所增加、年龄比较优势有所减少。但是,时间成本的付出也不会完全呈现负效应,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可能避免由于没有缓冲机制或试错经验所导致的重大人生失误或损伤。当然,对于间隔年的负效应,应该由社会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支持体系来帮助青年个体尽力规避和消除。

总之,间隔年的兴起,从其发生机制上看,主要源于在当今复合时空背景下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这是导致形成间隔期的重要外在或环境原因;而青年心理复杂性的增加,则是导致形成间隔期的重要内在或主体原因。间隔年正是作为青年外在的社会不确定性和青年内在的心理复杂性所生发的一种充满重重压力的时期,非常容易孕育新样态的青年文化。从发生学角度看,青年文化是青年的主体表达方式和表征符号体系;而从功能论角度看,青年文化可以起到缓解青年压力和做出行动导向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间隔年是一种青年文化的呈现形式,即最初从少数青年人中兴起的生活方式,从一种特殊的、不固定的社会行动样式,逐渐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固定化的社会行动模式。

三、生命周期新阶段的心理—社会发展新时空

1. 自我同一性于个体的独特意义

作为个体的人,其发展是持续一生的过程(即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不会在童年期就完全定

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青年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埃里克森提出的人生发展八个阶段理论的主要思想。当然,他所说的这种贯穿一生的发展进程,其核心特征是一种心理—社会发展,即其所强调的是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心理成长或人格成熟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青年期这一人生发展进程的关键性时期,个体面临着一项有待完成的重大任务:个体在自我追寻中做出自我确证,即建立起自我同一性,防止同一性弥散或混乱,最终形成稳定的人格系统(埃里克森在《儿童期与社会》中提出了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和自我同一性学说^[14],后来在《同一性:青年期与危机》中又对他先前提出的学说做出进一步的发展^[15])。在他看来,对于个体而言,在传统社会要完成这种心理—社会发展任务相对比较顺利一些,因为传统社会的特质是具有较高的结构同质性与运行稳定性;但在现代社会则一般不会太顺利,因为现代社会的特质是具有较高的结构异质性与运行变化性。换言之,在现代社会,青年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并非一件容易之事,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埃里克森用这个概念来说明青年在寻求建立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中将会经历一些曲折阶段,其深意是青年可能会延迟做出个人在生活、职业等方面的选择、定位和承诺。而且他还认为,处在现代社会中的青年,难免要遭遇自我同一性危机。但是,从合法延缓期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困境似乎可以不再称为危机,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探索过程,延迟性的选择和决定成为一种常态,而且这样做也是十分有益的^[16]。

青年期发展的深层本质体现在个体的心理—社会层面,尤其是因自我同一性问题的解决而获得成长。在埃里克森提出他的理论之后,其问题意识被不同学者从各自的理论视角进一步加以探讨。马希亚通过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进一步划分出自我同一性的四种状态类型,建立了自我同一性的类型学。四种类型分别表现为同一性确立、同一性早闭、同一性弥散或混乱和同一性延缓。其中,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还是体现在同一性延缓上,它对于探究、理解以及找到途径促进青年的人生发展进程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希亚继承了埃里克森的基本思想,强调在延缓期这一情势中尚未建立自我同一性的个体,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探索,寻找“我是谁”的答案。马希亚认为,那些无法跨越同一性早闭和同一性弥散或混乱的个体,在外在行为层面上都难以做出良好的适应。同一性早闭者的症状表现为十分刻板、苛刻、独断和自我防御;同一性弥散或混乱者的症状则表现为经常采取放弃态度,把自己的生活境遇归因于命运而不愿做出努力。因此,延缓期将会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经由其间,个体可以进行某些尝试,摒弃不适合自我的一切,发现和自己相符合的东西,包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这些方面都是确立稳固的自我同一性的重要基础^[17]。

2. 自我同一性的确立面临更多困境

埃里克森和马希亚对自我同一性的主体维度及其环境维度的微观层面的状况和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而在将这些状况和问题放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变迁维度的宏观背景中,尤其是当今剧变情势下进行深刻透视方面,吉登斯做出了重要探索和杰出贡献。他指出,高度现代性境况下,人们社会心理参照系变化已经对自我认同的确立造成了严重的困扰^①。这一思想对于理解

^① 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概念英文为“ego-identity”,他沿用了弗洛伊德的“自我(ego)”概念。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概念英文为“self-identity”。实际上,除埃里克森使用“ego-identity”之外,其他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基本上使用“self-identity”。因此,在中文层面上,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的概念也可以译为“自我认同”。

人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延缓期的意义具有深刻的启迪。根据他的分析,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影响自我认同的参照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在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化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全球化的扩展;第二个重要方面是风险时代的到来;后传统社会的来临是第三个重要方面;第四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化自然或人化自然的凸显。在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变化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信任模式的变迁,之于从前已经失去了稳定和恒常的基础,相互关系处在一种流动状态之中,从而降低了本体性安全感程度;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亲密关系的转型,性爱关系的基础发生了转变,从原来以经济或实用为根本,朝着以纯粹关系为根本的取向转变,在性爱关系选择上从以社会、政治环境为核心参照,朝着以性关系当事人为核心参照的取向转变;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家庭范型的重构,包括家庭性质的变化、家庭成员角色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18]。

在吉登斯看来,高度现代性境况下,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都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自我认同,使之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困境。他总结出自我两难困境的四种主要类型:统整性对碎片性、无力感对占有性、权威性对不确定性、经验的个人化对商品化^[19]。作为社会学家,吉登斯关注自我认同困境的主要着眼点不在于探讨人们本身的具体状况,而在于分析人们自我认同困境对于社会运行状况的影响,即他所指出的自我认同也会深刻地影响到全球化进程、风险社会的情势这些最为宏观的社会层面。因此,他提出的解决自我认同问题的方略,主要是从宏观层面的机制和途径着手。吉登斯关于自我认同问题可能引起更广泛和更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洞见,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同时,在他提出的超越自我认同困境的方略中特别强调微观层面上生活政治的作用,这对于解决当今青年确立自我同一性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难题而言,也具有启发意义。

青年人确立自我同一性或解决自我同一性问题的最有利外在社会环境特征,应该是具有人本化取向的。从历史演进阶段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角度看,现代性初期应该是最有益的时空。而随着时空复合化,社会变迁加速以及风险泛化,不确定性滋生,人的自我同一性的确立越来越难,青年人自我认同的确立和成年人自我认同的维系会面临各种压力并遭遇诸多困扰。吉登斯对于高度现代性境况下人们自我认同困境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便具有了观照人的生命周期全过程的意义。而个体能够拥有一个节律相对舒缓和环境趋于人本的时空,对于其自我同一性问题的解决和基本人格结构的完善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可以说,间隔年作为埃里克森的人生发展阶段理论中所强调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在当今时代和社会中的一种新的呈现形式,不仅可以呈现个体的能动作用,而且也可以扩展制度的积极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因其在当今时空中所具有的这些特质而将其表述为青年人心理—社会发展的新时空。

3. 间隔年:个体心理—社会发展的新时空

笔者曾经撰文分析指出,在当今复合时空状态中,影响青年自我同一性确立的环境和条件变得更加复杂,究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个体生命进程中的青年期与现实社会转型期相遇;二是青年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与置身其中的社会一起嵌入了全球化进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非全球化时代,青年自我同一性的确立主要受到外在塑造机制的主导作用,依据的标准是明晰的和恒定的。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全球化时代,青年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又逐渐受内在建构机制的强力作用,即主体的选择与自我强化,在参照系及其选择上变得复杂和易变。当今青年面临多重边际性情境。这种多重边际人特征会复合性地影响青年的自我同一性确立及其

结果呈现^[20]。埃里克森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的不断加速和社会结构的渐趋复杂,青年心理成熟的时限向后延伸了。具体而言,要完成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必须在以往时代的常规时限之上再增加一个延长时期,即他所称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

作为人生发展进程中关键阶段的青年期,个体面临诸多身份转变与角色适应的问题。埃里克森人生发展理论中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这一核心概念,旨在强调青年在这一特定阶段为了追寻自我、形成认同和发展身份而需要一个进行某种缓冲与调整、反思与定位的时空。在现代社会中,“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有着不同的潜在或显在形式,而当今方兴未艾的间隔年,可以说就是一种典型性或代表性的新形式。它打破了传统上青年个体发展惯例中那种从完成正规教育便进入职业生涯这样一种线性模式,而其间兴起的个体生活世界中的一种新时空和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则为青年人提供了一种专门去探索多样活动领域、体验诸种情境感受、探寻生命丰富意义、调整核心价值观、做出重要人生选择的机会结构。

4. 间隔年与传统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的区别

在埃里克森的理论中,青年期(12-18岁)的个体面临自我同一性确立和自我同一性弥散或混乱之间的冲突困境。传统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的具体情形表现为,作为一种个人时空,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时空,其内涵和外延是有限的。帮助青年人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和完成心理发展任务的主要实体和场域是学校和家庭,此外再加上一些有限的社会机构,如社区。青年人进行探索和践行的活动广度和深度都相对有限,比如能够参与社团活动、兼职打工和到各地旅游的条件和机会等并不是十分广泛。

与传统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的具体情形不同的是,间隔年作为一种新的时空形式,其独特性表现为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常规环境和固定条件的限制。具体而言,间隔年超越了学校、家庭以及社区等实体和场域所能够提供的活动范围及其内容,从而使青年人走出了熟悉的环境,进入到更广的领域,面对新鲜奇异的事物,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穿行,独自处理和解决难题,获得更加全面的成长。在探索的内容上,相较于传统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主要围绕学业和常规活动,间隔年触及的内容更加多元、复杂和新异,除了学业领域的探索和职业领域的实践之外,还会涉及公共志愿服务、生活技能提升、跨文化适应、新奇事物体验等。这一切都有助于青年人从多种维度和层面认识自我,构建、调整和发展健全的自我同一性。

四、心理—社会发展新时空的个体社会性成长

在间隔年这一个个心理—社会发展的新时空中,青年实现了对新的个体时空与社会时空的再嵌入,其实质在于个体获得了一种新时空,这种新时空是以重新嵌入社会新时空为特征的,其中包括了两个核心机制的作用。

1. 心理—社会发展新时空的运行机制

第一,作为自我同一性困境的缓冲带。在埃里克森的理论视野中,处于心理—社会发展合法延缓期的人(一般在18-25岁)在传统上主要是由高等教育机构和一定程度上的家庭来承担促进和保证他们顺利度过心理—社会发展合法延缓期职能的。但是,由于教育的功利性取向的

增强,全面教育或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有时大学反而成为认知困惑或心理焦虑发生的重镇。间隔年的出现,则通过一种独特的、暂时脱离制度化竞争的时空塑造,为青年人进行更加丰富的自我探索、更大程度的自由选择创造了一种新的契机。

第二,作为成年初显期得以体认的基地。阿奈特提出的成年初显期理论认为,处于18-29岁的青年身上发生的一些凸现独立性特质的新现象,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成年初显期的特征。在他看来,身份探索、不稳定性和自我关注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21]。而从间隔年的角度来看,通过扩展化的新时空,青年实际上获得了一种极其宝贵的试错成本可控的成长机遇与条件。主要包括:进行职业参与,如在社会企业实习;培养公共意识,如提供志愿服务;形成跨文化认知,如到国外旅行等。这种情境、场域及其意蕴,都是非间隔年的情境、场域及其意蕴不可比拟的。

2. 心理—社会发展新时空的功能体现

上述两种机制的功能实现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场景中达成的。间隔年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几个领域:职业实践或预备,如实习、技能培训、创业实验等,以及志愿服务、旅行。在这些领域获得的实际经验都是学校和家庭所不具备的。具体而言,间隔年对青年人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促进自我认知的完善和社会认知的深化。通过间隔年的丰富经历和独特体验,青年个体可以了解多样的生活方式和接触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进行反思和重构。比如,在实际社会生活场景中,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有助于启发青年个体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对社会公平的思考和对个人社会责任的觉悟,从而进一步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选择和人生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自我的人生定位。

第二,有助于确立健全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定位。在间隔年,青年人不断尝试新的角色,如临时工作者、志愿者、旅行者等,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体验中逐渐明确与自身特质相符合的那些部分,通过一定时间之后最终整合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比如,一个对社会工作感兴趣的大学生在间隔年通过参与公共服务,结识一些志趣相投的人,加深了对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的认识,从而确定将社会工作作为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完成了从最初兴趣爱好到职业身份确认的转变。可以说,间隔年提供了在真实工作场景中认识和体验不同职业角色的机会,有助于青年更加直观、深入、精准地了解职业内容,熟悉工作环境和运用知识技能。与传统的学校知识传授、职业规划课程相比,间隔年的亲身实践可以使青年个体更加精准地判断自己是否适合某一职业,避免盲目选择之弊,为更有发展潜能的职业生涯之路找到出发点并确定长期规划。

第三,提升扮演合格社会角色的综合性素养。在间隔年,青年人可以在更加真实而多样的环境中接触丰富和复杂的信息,促进塑造比较完善的人格结构,尤其是形成能动的自我,这样就可以更全面地形成在未来时期扮演合格社会角色所要求的综合性素养。主要包括几个逐次递进的方面:一是确立理想社会角色^①。青年人能够自主地选择和确定自己最喜欢、最擅长扮演的社会角色。个体在生命成长过程中,尤其是早期阶段将会形成一定的理想社会角色,能够把个人的未来发展进程如职业生涯规划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形成具体化的社会角色

^① 从个人角度上叫理想角色,从社会角度上又称期望角色,其内涵表现着社会对某一特定角色所预设的规范要求和行为模式。

预期,就如同在正式演出一台剧目之前,演员自主地选择和确定自己最愿意、最擅长扮演的角色。二是善于领悟社会角色^①。青年人能够自觉地训练和彩排自己所将扮演的社会角色。个体对于自己在人生规划中所选择和确定的、一定的理想社会角色,能够在认知层面和技能层面进行一定的预期性准备,即尝试提前扮演某些理想社会角色,就如同在正式演出一台剧目之前演员自觉进行的练习和彩排。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某个工作岗位进行实习。三是成功实践社会角色^②。青年人具体地扮演自己在社会体系中的实际社会角色。青年在经过间隔年之后,他或她都会在其生命历程中进入社会体系的新位置,对于所获得的新社会角色开始进行实际的扮演过程。对他或她而言,这个时候已经是在社会现实中的正式演出,个人在社会大舞台上扮演着现实角色,此时的观众是真实的。

第四,推动青年期向成年期更顺利过渡。当今时代,青年人生发展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其中之一便是青年期在个体生命进程时间表上的向后延长,使得“何时成年”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以往衡量成年的一些时序性的核心事件或标志(上学、就业、结婚、生子等)不再呈现原来的时序,加之有的标志性事件不再出现(比如,由于独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结婚、生子事件变得缺失),使得“如何成年”成为一个问题,等等。面对这种现实困境,理论上“怎么理解青年期和成年期”也成了一个问题。笔者认为,间隔年可以成为青年人迈向成年期的重要的时间阶段和空间场域,随着自我同一性确立这一关键心理—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青年人不仅可以因其自主、自决、自律能力的提升形成准成年人感甚至成年人感,而且可以因其行动感、责任感、成就感的驱动而历练出成年人的知识积累和核心能力,从而使间隔年成为推动青年期向成年期顺利过渡的一种崭新的机遇和基地。

总之,间隔年的作用体现在,可以促进青年个体通过探索而丰富其认知,通过体验而丰富其情感,通过践行而丰富其技能,努力确立自我同一性、获得生活意义、形成完善人格,从而更坚实和更自信地站在人生进程未来阶段的起点上。

五、正视间隔年的发生并构建有效的制度化保障机制

对青年而言,间隔年是一种社会特例,而不是社会惯例。间隔年的发生,除了对青年产生不可忽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之外,也带来了一些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为此,构建起有效的导向机制非常有必要,而后一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效,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间隔年从社会特例向社会惯例的转变。

1. 间隔年带来的挑战与引发的問題

第一,间隔年与传统观念之间存在某些冲突。尽管间隔年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普遍,但在现代化程度还不高的国家,对于间隔年的认知还存在差异。而这种认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

① 指个体对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的理解和感受。理解角色是领悟角色的基础,但由于个体所处具体环境不同,以及受自身认识水平、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等方面差异的影响,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个角色的规范要求和行为模式的理解和感受不尽相同。领悟角色也需要一定的扮演角色的能力作为基础。

② 指个体根据自身对于某个特定角色的理解而在执行角色规范要求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实际行为。领悟角色是成功实践角色的前提和基础。

影响到青年人对于自身参与间隔年的选择。最明显的观念差异是,认为间隔年会耽误青年人的宝贵时间,参与者将会偏离以往的教育进程、职业生涯的基本轨道,或者说,打乱了生命历程的常规秩序,这种偏离可能使青年在面对间隔年选择时感受到一定的社会压力和家庭阻力,从而最终放弃初衷,失去间隔年可能潜在的红利。

第二,间隔年里青年人缺少某些常规化的安全与保障机制。在一定意义上,间隔年是一种流变时空,青年个体处于一种不太固定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情境中,打零工、做志愿服务、旅行或干其他,个体在不同的时空之间穿行。这种变动不羁的场景,会使日常生活难以获得比较稳定的制度保障,如权益保障、医疗保险等,而且可能随时随处面临一定的安全风险,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健康安全风险等。一旦发生意外,个体可能陷入困境,影响其间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甚至导致其人生进程下一阶段的安排因非预期后果而完全改变。

第三,间隔年里一些青年人因自我管理不善而影响预期目标达成。选择间隔年对青年个体的自主性、意志力、稳定性和应变力等方面的素质都提出了很高要求,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目标实现需要比较完善的自我管理。正因如此,一旦个体的自律性减弱甚至丧失,那么间隔年就会成为真正的困惑期、迷失期、躺平期,无法通过缓冲时间和丰富体验在探索与实践完成自我调整、重新定位和整装待发;或者虽有规划但由于落实不力,在休闲娱乐中玩物丧志,荒废时光,未能实现预期的自我提升和应有成长。

2. 促进构建一种制度化保障的间隔年

当今社会尤其是高度现代性境况中青年向成年的过渡(尤其是测量过渡过程所需要的时限、衡量过渡完成所需要的标准等),已经成为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学术研究主题和现实社会问题。因此,可以预见,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发展的新时空,间隔年将会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当中呈现。当然,作为一种社会特例,若想使其对于青年的积极作用变得最大化,还需要在保障机制、导向机制等方面做出更全面、更有效的制度化构建和努力。

第一,不断提升对间隔年的社会共识度。随着全球化时代复合时空境况的凸现,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认识并感受到间隔年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而且由于社会不确定性的进一步增加,社会对间隔年的接受度还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形成更加宽容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更加宽松的社会心理氛围。这为青年人选择参与间隔年营造了有序的社会环境,会减少他们在选择间隔年时的心理压力和现实阻力。

第二,逐渐完善保障体系和服务机制。由于间隔年存在与正式社会机构(如学校)的联系暂时脱钩或减弱的情形,而青年人需要基本安全感和社会保障感,为此可以构建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成立多样化的服务机构,为间隔年参与者提供支持。比如,成立专业性的间隔年咨询机构,协助青年制定合理规划;完善相关的保险产品,覆盖间隔年工作、旅行和休闲的各类风险;打造规范的实习和志愿服务平台,保障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等。

第三,加强与教育领域、职业发展的高度融合。间隔年不应被视为青年个体的一种独享经历,而应与社会结构相关方面更多地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使青年人以新的方式与教育领域和职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有机地融合,学校、就业机构、家庭等也会更加认可间隔年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为有间隔年经历的学生再度深造或获得就业岗位提供更多支持。比如,大学在招生时,将间隔年经历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企业在招聘时,更看重青年人在间隔年期间养

成的实际践行、跨文化沟通、危机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间隔年成为青年人心智成长、人格完善、技能拓展和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总之,间隔年的制度化保障,既是资源配置调节的一种新方式,也是风险分配调整的一种新形式。以往,青年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主要是由学校和家庭来承担的,而现在的间隔年则可以在此方面带来某种变革,即通过一定的市场化运作,比如专业性中介机构的作用以及制度化认可,再如某些大学试行的可以延迟入学的政策,将青年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风险,转化为可加以管理的青年成长性安排。这种制度化风险管理方式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效应,则是降低了青年个体由于主动选择延迟进入生命历程下一阶段可能面临的显在或潜在的污名化风险。

[参 考 文 献]

- [1] 孙元涛 祖宇轩:《在“中断”中寻找前行的力量——美国大学“间隔年”现象的诠释与反思》,载《比较教育研究》,2024年第12期。
- [2] IGEA.Global Gap Year Survey Report, 2022, p.18.
- [3] 李建军 王 勇:《作为“成年新礼”的“间隔年”:过渡仪式、认同重构与主体实践》,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 [4] 吴晓隆:《逃离与回归:个体化视角下青年间隔年旅行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5] 敖成兵:《间隔年与中国青年社会化》,载《当代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
- [6] 苏 萍:《转型社会·过渡事件·制度安排——关于青年向成年过渡研究的社会学思考》,载《当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
- [7] 田学军 蔡 妍 文 涵:《间隔年践行的中西方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大学教育培养路径的启示》,载《江西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 [8] Parsons, T.. The School Class as A Social System: Some of Its Functions in American Society, Harvard Review, 1959, (29).
- [9] J.J.阿奈特:《长大成人:你所要经历的成人初显期》,段鑫星 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2页。
- [10] 乌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 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 [11] 沈 杰:《青年期作为过渡期:其理论与模式面临挑战》,载《青年学报》,2018年第3期。
- [12] 李春瑶:《脱嵌与迷惘:“间隔年”青年的另类内卷实践》,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 [13] 王尧骏 张姗姗:《间隔年:“95后”学生毕业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载《教育评论》,2020年第2期。
- [14] Erikson, E.. H..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50, pp.89-112.
- [15] Erikson, E..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8, pp.62-87.
- [16] 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26页。
- [17] Marcia, J. 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3).
- [18] 乌里希·贝克 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0-119页。
- [19]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 方 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0-236页。
- [20] 沈 杰 陈玉真:《当今青年多重边际人角色困境与超越》,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
- [21] Arnett, J. J.. Emerging Adulthood: The Winding Road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2-61.

(责任编辑:魏心怡)